

中国边疆民族考古文库

东北与 北方青铜时代

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 编

文物出版社

中国边疆民族考古文库

东北与北方青铜时代

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 编

文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东北与北方青铜时代 / 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 —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6. 4

ISBN 978-7-5010-4459-7

I. ①东… II. ①中… III. ①青铜时代文化 — 中国 — 文集 IV. ①K871.34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85239号

东北与北方青铜时代

编 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 张征雁

责任印制: 张道奇

出版发行: 文物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东直门内北小街2号楼

邮 编: 100007

网 址: <http://www.wenwu.com>

邮 箱: E-mail: web@wenwu.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32.25

版 次: 2016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0-4459-7

定 价: 178.00 元

本书版权独家所有, 非经授权, 不得复制翻印

中国边疆民族考古文库

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 编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李裕群 王仁湘

副主编

刘国祥 巫新华

丛德新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仁湘 王飞峰

王 鹏 丛德新

仝 涛 艾力江·艾沙

李裕群 巫新华

郭 物 黄 珊

本卷主编

刘国祥

前言

东北地区青铜文化内涵丰富，特征鲜明，是中国青铜文化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东北亚洲地区青铜文化发展进程及交流关系中占据十分突出的地位。

随着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材料的不断丰富，已大体构建出东北地区青铜时代的编年框架和谱系结构，为推动东北地区青铜文化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目前经过正式命名的东北地区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类型主要有：分布在辽西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魏营子类型、夏家店上层文化；分布在下辽河流域的高台山文化、顺山屯类型、新乐上层文化；分布在辽东地区的双砬子二期文化、庙后山文化、双砬子三期文化（也称于家村上层文化或羊头洼类型）；分布在第二松花江流域的西团山文化以及分布在嫩江下游地区的白金宝文化等。朱永刚先生将东北地区青铜文化划分为夏至早商、商末周初和西周中至战国依次发展的三个阶段。其中，夏家店下层文化、高台山文化、双砬子二期文化属于夏至早商期的青铜文化初级阶段；魏营子类型、顺山屯类型、新乐上层文化、庙后山文化、双砬子三期文化属于商末周初期的青铜文化发展阶段；夏家店上层文化、辽东与大小凌河流域的青铜短剑遗存、西团山文化、白金宝文化属于西周中至战国期的青铜文化全盛阶段。

在东北地区青铜文化发展进程中，辽西地区始终处于领先和主导地位。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居住和祭祀遗址点分布密集，出现以大甸子为代表的中心性城址和等级分化显著的墓地，还有以城子山为代表的超大规模的祭祀遗址群；三足陶器彻底取代了延续数千年的平底筒形陶器，彩绘陶盛行，出现制作精美的仿中原地区青铜器的陶质礼器；青铜制品出现，多为耳环、指环和镞等小件器物，辽宁锦县水手营子一座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内出土一件长达 80.2 厘米的青铜戈，柄身两面有复杂的纹饰，代表了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铸造青铜器的最高水平。夏家店上层文化发展至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辽西地区青铜文化进入

鼎盛阶段，也代表了整个东北地区青铜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夏家店上层文化青铜器种类丰富、式样繁多，可分为兵器、工具、车马具、日用器具、装饰品和杂器等，对东北其他地区、军都山、燕山山地周围及鄂尔多斯等地区的青铜文化均产生了一定影响。同时也应看到，中原地区青铜礼器和兵器的流入，对于丰富夏家店上层文化青铜器的内涵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赤峰林西大井铜矿遗址集采矿、选矿、冶炼和铸造于一体，丰富的铜矿资源和日渐成熟的开采、冶炼、铸造技术是夏家店上层文化青铜器得以发展繁荣的重要条件，在东北乃至北方地区早期铜矿开采、冶炼史上占据独特地位。

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关于东北地区青铜短剑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课题之一，尽管在青铜短剑的起源和传播方面存在不同意见，但在分布区域、类型划分、形制演变、使用年代、铸造技术、文化传播和族属问题研究方面均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此类青铜短剑在日本和朝鲜均有分布，日本考古界曾称之为“满州式铜剑”、“辽宁式铜剑”；朝鲜的研究者称之为“琵琶形剑”。林沅先生指出：“本系铜剑在形态上有自身特点，历经了相当长时期的发展和演变，分布有显著的地域性。如单从其某一形态特征命名，都不全面，若命名为‘辽宁式铜剑’也不足以反映其实际分布情况。故建议命名为‘东北系铜剑’”。乌恩先生则认为：“如不涉及文化属性而单指铜剑而论，应取这种类型铜剑有别于其他类型铜剑的基本特征，称之为‘曲刃青铜短剑’，更为适宜”。目前这两种提法均被学术界采纳，并在研究中广泛使用。

北方青铜文化分布区主要包括以陇山为中心的甘宁地区、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陕北和晋西黄土高原、冀北及辽西地区。这里需要指出，辽西地区以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为代表，属于东北青铜文化体系中的核心组成部分，同时又地处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东段，对中国北方长城沿线乃至欧亚草原地区的青铜文化均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乌恩先生对殷至周初的北方青铜器进行了系统研究，他认为与商周王朝毗邻的西北黄土高原、鄂尔多斯和燕山南北地区是商周之际北方青铜器的分布中心和发源地。在北方青铜文化发展进程中，一方面受到了商文化的强烈影响，西北黄土高原发现多处北方青铜器与晚商青铜礼器共存，辽西地区发现商周铜器窖藏便为重要实证；另一方面北方青铜文化又反过来影响了商文化，而这一点往往被人们忽视，殷墟出土的管銎斧和戈、鹿首刀等均为北方青铜器传入商文化的重要证据。在论述中国北方青铜文化与卡拉苏克文化的关系时，乌恩先

生强调要充分估价北方青铜文化的重要地位，他指出：“商周时期北方青铜文化的繁荣及其对邻境文化的影响是显著的。以往有些研究者常常忽略这一点，他们在探讨商文化与卡拉苏克文化的关系时，无论是主张商文化影响卡拉苏克文化者，还是卡拉苏克文化影响商文化者，总是把两者直接联系起来，而把北方青铜文化只是作为媒介，这实属是种偏见。实际上，同卡拉苏克文化有联系的是北方青铜文化，而非中原商周文化，即使商周文化对卡拉苏克文化有某些影响，也是经由北方青铜文化来实现的”。

林沅先生对商文化青铜器与北方地区青铜器关系进行过深入、系统的研究，他指出：“从中国考古学的角度看，在首先认识了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中心的商周文化之后，开始逐步认识到北方地区还存在着与中原青铜器有别而自成一系的青铜器。进而认识到这种北方系青铜器，至少在商代后期就已经分布在现时中国国境以外很大的一片地域。”北方系青铜器概念的提出，进一步明确了商文化青铜器和商代北方系青铜器是彼此独立的两个系统，但又互相渗透，彼此丰富了各自的内容，推进了各自的发展。关于北方青铜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交流过程，林沅先生曾做出如下精彩的描述：“中央亚细亚的开阔草原地带，是一个奇妙的历史漩涡所在。它把不同起源的成分在这里逐渐融合成一种相当一致而稳定的综合体，又把这种综合体中的成分，像飞沫一样或先或后地溅湿着四周地区。”

深入推进东北与北方地区青铜时代考古研究，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学术任务，我们应该在前辈学者辛勤耕耘的基础之上，通过开展卓有成效的田野考古工作，建立、补充和完善东北与北方地区青铜文化考古编年体系，加强与中原及邻境地区青铜文化比较研究，谱写出该领域新的学术篇章。

编 者
2016 年 3 月

目 录

1/东北青铜文化的发展阶段与文化区系	朱永刚
21/内蒙古东南部地区青铜时代的几个问题	刘观民
28/中国东北系铜剑初论	林 沅
52/中国东北系铜剑再论	林 沅
68/论中国东北地区含曲刃青铜短剑的文化遗存	靳枫毅
127/关于曲刃青铜短剑的若干问题	迟 雷
135/中国东北地区、内蒙古地区和朝鲜北部青铜短剑的研究	佟柱臣
143/论中国东北地区与朝鲜半岛出土的短茎曲刃青铜短剑	朱凤瀚
164/试论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青铜短剑	刘 冰
174/夏家店上层文化青铜器研究	刘国祥
226/夏家店上层文化空首青铜斧及相关问题	齐晓光
238/试论西团山文化中的青铜器	刘景文
247/中国北方系青铜器文化和类型的初步研究	田广金
288/从昭盟发现的大型青铜器试论北方的早期青铜文明	苏 赫
294/殷至周初的北方青铜器	乌 恩
319/商文化青铜器与北方地区青铜器关系之再研究	林 沅
346/中国北方青铜透雕带饰	乌 恩
360/中国北方青铜短剑的分期及形制研究	郑绍宗
376/中国北方地区青铜短剑分群研究	翟德芳
400/试论我国北方地区釜柄式柱脊短剑	朱永刚
410/长城地带青铜短剑的考古学文化和族属	韩嘉谷

429/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渊源 田广金 郭素新

449/以陇山为中心甘宁地区春秋战国时期北方青铜文化的发现与研究 罗 丰

475/中国北方青铜文化与卡拉苏克文化的关系 乌 恩

493/东北与北方青铜时代考古文献目录索引

505/编后记

东北青铜文化的发展阶段与文化区系*

朱永刚

我国东北地区青铜文化的考古研究开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首先是能够把一些广泛使用石器生产工具并已出现青铜冶铸技术的考古遗存,从过去认识的“石器时代考古文化”中分离出来^[1]。这一时期,在相继发现的战国以前墓葬中出土的不同于中原式的青铜器^[2],以及野外调查采集标本呈现出的复杂文化内涵,也提示人们这里可能存在着年代更为久远的金属文明。60 年代初,在赤峰附近发掘的一个以多层文化层叠压的遗址命名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使内蒙古东部和辽宁西部青铜文化考古实现了重大突破^[3]。在田野考古工作中,还将这两种青铜文化面貌与阶段的认识推广到东北其他地区。70 年代以后,随着大规模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的展开,东北青铜文化考古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许多空白被填补,不断涌现的新材料也较大程度地丰富了纵横联系的中间环节。一些考古工作者在对区域内考古学文化深入探讨的同时,又注意到不同区域之间考古文化的相互联系与各自发展轨迹的考察,一个历史的轮廓已愈来愈清楚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在此基础上,建立东北青铜文化的年代框架与谱系结构,不仅是对考古学文化本身研究的纵向深入,而且也是探索东北古代民族历史发展进程的必然途径,所以已成为当前东北青铜文化研究的重要一环。

东北的青铜文化约发生在公元前 21 世纪,结束的时限大体是随燕文化的到来及秦汉势力的扩展而逐步衰落。在这一时间段内,由于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及地理环境的差异,各地逐渐形成的独具特征、自成序列的青铜文化,发生的时间有先有后,延续的年代有长有短,分布格局因不同时期而表现为多层次的变化与不均衡。根据上述特点,通过对青铜器铸造工艺、技术水平和生产规模的衡量及对考古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可将东北青铜文化划分为夏至早商、商末周初和西周中至战国依次发展的三个阶段,其最后一个阶段又以春秋战国为时限分为前后两期。本文将依据这一顺序,从把握东北青铜文化的发展脉络入手,就区域考古学文化的消长变异、结构形式、时段特点及古代民族关系等进行探讨。

* 选自《考古学报》1998 年 2 期。

一 青铜文化初级阶段的夏至早商期

东北最早的青铜文化发生于北纬 $38^{\circ}30'$ ~ $43^{\circ}30'$ 之间的辽河以西及辽东半岛南端,已确认的三支青铜文化分布在这三个地区内。

夏家店下层文化分布于辽西区。辽西区是指下辽河以西,包括北到内蒙古东部的西拉木伦河,南达河北北部的拒马河,西至张家口、宣化一带,东抵医巫闾山。在这样一个广大地区形成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多种文化因素交织、融合、孕育的结果,它既具有与周邻其他考古学文化相区别的统一的典型性特征组合,又具有不同文化遗存之间所形成的地域差异。目前,按其分布地域所显现的文化内涵差异,可划分为三个层次:燕山以北的西辽河水系遗存是承红山—小河沿文化,并吸收了二里头文化、岳石文化的因素,接受先商文化的影响发展起来的。在其存续的时段内,文化内涵稳定,其间没有明显间断,该文化的典型性器物均源于这里,所以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中心分布区。燕山南海河以北水系区,根系于雪山二期文化并渗透部分龙山文化因素,作为相邻的不同渊源的考古学文化,在以后的发展进程中,纳入夏家店下层文化的范畴。但受文化传统和地缘因素的制约,表现出某种文化上的变异。这里是与中心区保持密切交往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亲缘分布区。位于西部的壶流河流域区,可见到夏家店下层文化典型性器物,但与上述两区比较,文化内涵包容了有着本质区别的多元谱系文化成分,因而是夏家店下层文化辐射的地缘文化区。于此,按谱系线索和地理分布情势,可将夏家店下层文化区分为西辽河、海河北和壶流河三种文化类型。

迄今测定的夏家店下层文化 ^{14}C 年代数据已有20余个^[4]。其中偏早的数据均出自西辽河类型,大体接近龙山晚期文化的年代。其他两类型从地层关系看,均晚于当地龙山期遗存,而被二里冈上层文化或相当于晚商时期遗存所叠压^[5]。由此表明,夏家店下层文化是从北向南发展的,其主要年代跨度相当于中原夏至早商阶段。

分布于下辽河区的高台山文化首先因墓葬的发掘而被识别。目前在新民高台山^[6]、彰武平安堡^[7]、阜新平顶山^[8]等地,发掘的墓葬有200余座。墓葬中随葬的壶和钵(碗)施红陶衣,出土时钵(碗)多覆扣于壶上,这种特殊丧葬习俗是高台山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遗址出土的陶器以素面红褐陶为主,以直腹式陶鬲为代表的器物及抹斜口沿、外叠唇和发达的器耳等为特点,构成了与夏家店下层文化明显不同的陶器组合。已明确界定的高台山文化以柳河为中心分布,其文化影响还波及到沈阳、库伦、奈曼、敖汉等毗邻地区。

根据高台山、平安堡、平顶山遗址的地层叠压关系,高台山文化年代上限不早于当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偏卜子类型,下限年代则不晚于与魏营子类型相当的“平顶山三期遗存”。

考察高台山文化来源,偏卜子类型是下辽河区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晚的新石器时代遗存。虽然两种文化面貌明显不同,但偏卜子类型的某些陶器,如平底筒形罐、高体竖桥耳壶在基本造型特点上可能为后来的高台山文化所继承,只是由于年代尚不能衔接,而无法明示其具体演化过程。近年新发现的“平安堡二期遗存”弥补了当地新石器晚期遗存向青铜文化过渡的中间环节^[9]。就“群”的面貌而言(“群”,即文化特征组合),该地区平底筒形罐的消失和袋足三足器的出现及两种具有时代特征类型品的并存现象,为探索高台山文化的来源提供了重要线索。

高台山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相邻,它们的迄止年代虽有参差,但在主要年代序列上却有相当的重合。已有研究成果认为两种文化存在着密切的交往关系^[10]。前期,夏家店下层文化对下辽河区的影响起了决定性作用,主要表现在高台山文化演化过程中对袋足三足器制作工艺的借鉴与吸收;后期,以高台山文化向西的扩展为主。这一时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红褐陶器增多,绳纹衰退,而在随葬陶器和丧葬习俗方面反映的渗透现象尤为明显^[11]。至于在科尔沁沙地南缘到医巫闾山以北两种文化的接触地带,则更为直接地表现出彼此文化消长中的交错分布和相互影响^[12]。

双砣子二期文化分布于辽东半岛南端,实际上这种早期青铜文化包含了两种文化类型:一种以双砣子中层为代表^[13],其器物造型和制陶风格与山东岳石文化十分相似,年代亦应相当,但其上下限或较后者为晚。另一种以上马石瓮棺墓为代表^[14],其陶器的子母口、假圈足和轮制特点与双砣子遗址中层遗存相同,但在陶器中没见豆、杯、三足器,墓葬的形制也明显不同。前者分布于半岛南端的旅大地区,属岳石文化系统;后者主要分布在金县以北至碧流河之间的黄海沿岸及周邻诸岛屿上,其“群”的整体面貌突出了对当地传统文化的继承。

这一时期的冶铜考古资料以夏家店下层文化较为丰富,见于报道的出土地点有:宁城小榆树林子、赤峰夏家店、大厂大坨头、蓟县张家园、昌平雪山、房山琉璃河、唐山小官庄等^[15],铜器皆为喇叭形耳环、指环、小刀和镞等小件器物。与夏家店下层文化关系密切的高台山文化也发现有小刀、喇叭形耳环和铜饰件。经对小官庄的两件标本鉴定,含锡量约10%,为锡青铜器。这种青铜器铸造后的硬度是88B,如再经锤锻还可提高一般武器和工具等锋刃器的硬度。

由锻造到铸造是铜器制造的一大进步,由单范到合范则是技术手段的发展。在赤峰四分地和彰武平安堡遗址出土的带子母榫的铸范^[16],均可被鉴定是合范。而敖汉旗大甸子墓葬出的铜套件^[17],则反映这一时期人们对合范和内范铸造技术的一般掌握。近年锦县水手营子出土的一件铜柄戈^[18],通长80.2厘米,重量超过1公斤,柄身两面饰满复杂的花纹,是迄今发现的代表夏家店下层文化最高铸造水平的青铜制品。此外,大甸子墓葬出土的成组陶爵、陶鬯和彩绘陶器的花纹风格与纹饰布局,也很容易使人联想起与铜容器的关系^[19]。

以上引证的材料虽比较零散,但可以肯定地说当时已脱离了金属铜制作的最原始阶段。就已具备的各要素特征来看,铜器制作达到了一定水平,甚至有可能铸造小型铜容器。所以夏家店下层文化和高台山文化是进入青铜时代的考古文化。

辽东半岛的青铜文化开始于何时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有人以大连大嘴子遗址曾出土的一件青铜戈为依据,认为该地区相当于龙山期的双砣子一期文化已进入青铜时代^[20]。从北方地区大文化背景来看,中原二里头文化始进入青铜时代。在此之前,整个黄河流域包括山东龙山文化在内,铜器的出土地点和种类虽有不少,青铜器也占有一定比例,但尚没有达到铸造青铜戈那样的工艺水平,而东北同时期遗存更无确切实例可证。大嘴子青铜戈还有待进一步考实,所以本地区先于双砣子二期进入青铜时代的认识应慎重考虑。

岳石文化是继山东龙山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一种青铜文化。目前经正式发掘的遗址虽不多,但普遍出有青铜制品,除一般工具外,还发现了容器残片^[21],可见其青铜铸造业已有了较大发展。双砣子二期文化的相关遗存与岳石文化有着十分相似之处,相信只有大量岳石文化居民漂洋过海实现了对旧有文化的占领,并形成新的居民点之后,才会出现这种现象。从现有资料分析,辽东地区首先发生在半岛南端的早期青铜文化,应是受岳石文化的强烈影响所致。以往在新金县单砣子曾出土的冶铜考古资料^[22],也会随田野考古工作的开展而有新的发现。

概之,东北早期青铜文化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时段性。夏家店下层文化、高台山文化、双砣子二期文化及相关遗存是青铜时代的考古文化。它们在各自区域考古学文化编年序列中,均呈现出较前期文化面貌明显的阶段性的变化。其中辽西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出现大量绘于陶器上与中原青铜礼器极为相似的彩绘纹饰,广为流行的占卜巫术,象征父权制军事组织的权杖,反映社会等级化的墓葬形制,以及稠密的人口和大型中心聚落所显现的首邦制社会结构,均揭示了文明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已经形成。青铜器作为跨越时代的重要标志,具有鲜明的时段特征。

二是不平衡性。上述诸青铜文化,以辽西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发现的铜器最多,发展水平最高。相比较,其他地区出土的青铜器不仅数量少,冶铸技术落后于夏家店下层文化,而且作为衡量文明的诸要旨特征也远不如辽西地区发育。这种区域间文化发展的不平衡现象,是东北早期青铜文化乃至影响到其后发展进程的重要特征。

三是多元性。从区域考古文化自身发展线索来看,东北早期青铜文化的形成是错综复杂的。据报道,辽西冶铜遗存的出现最早,向上可追溯到距今 5000 年前的红山文化^[23],所以该地区青铜文化应是在新石器文化基础上延续发展而来,是自有渊源的。而辽东地区传统文化的沉积却终未能引导由新石器向金属文明的过渡,这一地区最初冶铜术的出现是由岳石文化传入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以往被确认为夏家店下层文

化典型性器物的喇叭形铜耳环,也见于下辽河流域的非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存^[24]。而更为奇怪的是,与分布于西伯利亚平原的安德罗诺沃文化的铜耳环极为相似。已有学者推断“相距如此遥远的定居族团之间会发生这种交流”,“其间必有流动性强的人群作媒介”^[25]。显然,活跃于欧亚草原以畜牧为主的非东亚人种人群,从这一时期就达到过渤海西北沿岸地区,并与那里的定居族团发生接触。作为文化载体,喇叭形铜耳环的出现,说明这种传播曾对东北早期青铜文化产生过毋庸置疑的影响。

二 青铜文化发展阶段的商末周初期

商末周初时期。来自河套及鄂尔多斯高原的牧业及半农半牧部落或族团,对分布于渤海湾西北沿岸的农业文化造成了很大破坏。辽西地区曾一度发达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被中断,兴起于下辽河流域的高台山文化也在迁徙中发生了分化。辽东地区因较少受到这股东渐势力的冲击与干扰,在半岛南端继续按自身文化轨迹发展的同时,半岛北部亦出现了新的青铜文化。此间,东北青铜文化发展时代的特殊现象是,西面冲突中的文化变异和东部平稳过渡中的协调发展并存,并由此形成错综复杂、谱系多元的考古学文化分布格局。

近些年来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证明,夏家店下层文化结束以后,在原辽西中心区出现的是魏营子类型;在燕山以南海河北系区继承的是张家园上层类型^[26];在壶流河水系区,因可辨析的该阶段材料较少,文化性质尚难认定。

魏营子类型分布于努鲁儿虎山至医巫闾山之间的狭长地带,北境已抵下辽河流域。该文化的年代,根据喀左南沟门遗址的地层叠压关系,以及对朝阳魏营子西周铜器墓填土陶片的确认,初步断定在商代晚期到西周早期^[27]。而其最后时限可能有一个由南至北渐远的过程,即南面大小凌河流域结束得早,北面靠近下辽河流域结束得晚。

通过文化因素分析,魏营子类型陶器群可划分为反映不同文化渊源的两种器物组合:一组,陶器表面多拍印绳纹,纹理细密而浅。典型器物有花边口沿鼓腹鬲、双耳罐、沿面饰绳纹的斜直腹钵。以花边口沿鬲谱系为线索,它是最迟至商代晚期由鄂尔多斯高原沿内蒙古长城地带向东延伸文化的一部分^[28];另一组,陶器表面多磨光,部分器物肩部饰有压印或刻划的三角纹饰带。典型器物有直腹鬲、矮领壶、外叠唇盆和圈足钵,其器物形态明显与高台山文化相类,它有可能是高台山文化南进的一支。这两组器物文化渊源虽不同,但在其分布范围内均不见游离对方而单独存在的另一方,表明两者已紧密地结合为一种考古学文化。进一步分析还可以发现,不同地域且反映一定早晚关系的魏营子遗存,所含两组文化因素的比率亦有所不同。大小凌河流域的魏营子类型遗存以花边口沿鬲代表的特征组较为突出,居主导地位。而在靠近下辽河流域区的同类遗存^[29],与高台山文化互为对应的文化成分则表现得更为充分。随着今后工作的逐渐深入,或许将

会区分出不同的地方类型。

努鲁儿虎山以西的原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心分布区,商末周初时期的陶器遗存甚少。零散所见,如克什克腾旗天宝同、宁城西门外、建平水泉遗址中层等^[30],虽具有魏营子类型的某些特点,但多采集品,缺少共存关系,因整体文化面貌还不太清楚,所以一直未能得到确认。

燕山南麓的张家园上层类型,分布范围与原夏家店下层文化海河北类型基本重合。该类型陶器群除了具有当地夏家店下层文化一般发展进程的诸要素特点外,还含有其他非本地文化成分。“最突出的是直领花边鬲和高领凹沿的陶鬲”^[31],前者与魏营子类型同类器大概有共同的来源;后者属先周文化代表性器物。所以,张家园上层类型是在继承和发展了夏家店下层海河北类型的基础上,又吸收融合了包括先周文化在内的多源头文化所形成的一体文化。

西周早期召公封燕,随着周人代表的中原系统文化的到来,张家园上层类型逐步解体并最后消亡。从分布地域和与周人的密切关系推测,张家园上层类型应是周初封燕后所涵盖燕文化之一部分。

下辽河区,继高台山文化之后,考古学文化的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由统一特征的一种考古文化分化成若干种年代相近、面貌各异的文化遗存。

下辽河以西,以康平顺山屯命名的顺山屯类型^[32],与高台山文化比较,部分陶器的形制与风格相似。但在这类遗存中,出土数量较多且形式富于变化的鼓腹鬲与高台山直腹鬲属于不同的陶鬲谱系。其基本造型,尤其是个别口沿饰附加堆纹的标本,与魏营子类型的花边口沿鬲相近,属于同谱系之衍生器。

下辽河以东的沈阳新乐上层遗存是该地区最早通过发掘认识的以素面三足器为代表的青铜文化^[33]。抚顺望花遗址及相关遗存可并入新乐上层文化^[34]。该文化以鼎为主要炊器,鬲极少见。

下辽河区各遗存文化特征有一定共性,但以下辽河为界,东西分布的以鼎为主要炊器和普遍使用鬲的遗存,则显然具有相当的独立性。而法库弯柳、沈阳老虎冲等遗存^[35],因文化面貌既此既彼的特点,尚难以作文化性质的判定。这一时期多种遗存交错分布,共存并立,反映了该区域内多元的考古学文化谱系关系。

在下辽河以西燕山南北的广大地区还存在着另一种北方式青铜文化遗存。据初步统计,迄今为止,辽宁境内出土的青铜遗址有11处(共78件)内蒙古赤峰地区先后采集的有13件;河北北部有明确出土地点的有三批,加上采集品在内约不少于30件。总数已超过百件^[36]。上述地区发现的北方式青铜器以拱背翘尖环首刀最多,管釜式斧、釜啄戈、戚出现的频率也较高,另外一批特异器形如环钮器盖、人首形匕、连钩叉、鹿首锥等也极富特色。目前的研究成果已将太行山以东、下辽河以西燕山南北的北方式青铜器划分为一个地域群^[37]。

从这些青铜器的具体出土地点来看,除个别见于遗址和墓葬,多数为窖藏,但几乎都不同陶器有确定的共存关系。可以设想,在上述以陶器划分的考古学文化分布区内,还分布着很少使用陶器甚至不使用陶器、以游牧业为主要生活方式的非定居人群,他们拥有的北方式青铜器,正是游牧文化的佐证。由于从黑海沿岸到蒙古高原都发现有北方青铜器。所以这一时期各个不同群体的游牧文化是整个欧亚大草原的主导性文化。河套的鄂尔多斯高原和陕晋接壤的黄河两岸地区,恰好处于中原传统农业文化区与草原游牧文化区的中介地带。大约于公元前二千纪末至一千纪初形成的由农耕畜牧型经济向单一畜牧业转化的游牧部落^[38],开始经由内蒙古中南部、山西和河北北部向东迁徙,直抵渤海西北沿岸地区,由此形成一条以内蒙古长城沿线为特定时空范畴的文化传播带,并在这条传播带的东端聚集起新的游牧文化群体。据研究,他们可能是西周青铜器铭文中所提到的“𠂔”人^[39]。如若将大小凌河流域屡有发现的商周式窖藏青铜器联系起来考虑,并依唐兰先生所释之“孤竹”,则与商末周初“𠂔”人活动范围有一部分重合。或许历史上有名的孤竹国乃是“𠂔”人或与其有密切关系的人群所建立的方国。

辽东地区这一时期出现的两支青铜文化:北部形成的是庙后山文化;南端继之的是双砬子三期文化。以本溪庙后山洞穴墓命名的庙后山文化^[40],丧葬习俗独特,主要分布于太子河上游的千山腹地。庙后山文化跨越的时间较长,年代上限约可追溯到商代之前,年代下限至商周之际可划分为早晚两期。早期,文化内涵单纯,陶器群自身特点突出,尤其是遗址中不见三足炊器,与下辽河及以西地区同期青铜文化在传统炊器使用上有很大区别。晚期,以千山山地为活动中心的庙后山文化分布范围扩大,向南已推进到黄海沿岸的丹东地区,并同时与下辽河流域和辽东半岛南部的考古文化发生了不同程度的交流。通过类型学分析,不难发现此间各自陶器群中互为对应的共有文化成分。

双砬子三期文化是岳石文化在辽东半岛的影响消退以后,在原土著文化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一支有浓厚地方特色的青铜文化,也称“于家村上层文化”或“羊头洼类型”^[41]。于家砬头积石墓,是以石块堆砌墓圪并彼此相连构成像蜂房状的积石墓地。墓葬中出土的镞、鱼钩、环、泡等小件青铜制品,是该区域发现的有明确出土地点且文化属性清楚的青铜器^[42]。双砬子三期文化的陶器群已基本摆脱岳石文化的制陶风格,陶器表面多饰有纵向排列的藕节状泥条堆纹、凹弦纹、划纹和点线纹。典型器类中的罐和壶出现频率最高,形式富于变化,它们除部分保留着传统的造型特点外,出现了一些新器形。于家砬头积石墓晚期墓葬出土的弦纹罐和口唇状附耳钵口壶,在类型学上已可以与下一阶段普遍出现的石棺和大石盖墓随葬的同类陶器相联系。双砬子三期文化既有对本地区原有土著文化的继承发展,又有逐渐形成并最终推广到整个辽东地区新文化因素的增长。